

关于浙江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前景问题的若干思考

严士凡 卢新波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浙江的发展道路是自发形成的，浙江的体制是在浙江自然历史文化条件下产生的一种市场经济的自然形态。浙江模式是浙江精神及相应的行为方式的产物，本质上是一种“软件”概念。浙江发展模式的优势不仅表现在“硬件”方面，还表现在人文背景和商业传统以及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观念体系等“软件”方面。浙江文化中个人自主的精神是浙江自发发展道路形成的根本源泉。未来浙江发展的优势也在于浙江精神的发扬和扩大。

【关键词】浙江模式 自发秩序

【中图分类号】F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 — 3947(2003)01 — 0089 — 05

一、浙江模式的选择

我们讲的模式，指的是一种体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精神及相应的行为方式，它是一种软件概念，关键的是组织，而不是其表达形式。因此，浙江模式既是浙江精神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中的体现，也是文化观念、组织结构和人际关系的自由和开放精神的产物。从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的形式上看，体现为专业市场、家庭工业、小城镇建设和个体私营经济等的形成和发展，这是浙江经济增长中可见的基本形式。但这些可见的形式只是经济模式的表达方式，而内在的精神和由此产生的行为方式才是模式的本质。在浙江精神中最根本的是自主发展的精神，个人自主是浙江文化的特色，这种精神是缔造企业家的文化土壤，浙江模式取得的成就也在于浙江文化传统中有这种“比较优势”。浙江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其经济动力的源泉就是来自人们的自主创业，是个人的首创精神、竞争和自由交易得到充分发展的结果，这是新的经济秩序的实质，是经济发展源源不断的动力所在。

改革开放后浙江所形成的道路，主要是依靠群众自发地走出来的，体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自发秩序。浙江人靠着自主改革，自担风险，自我发展，自强不息的“四自精神”，闯出了一条促进经济繁荣的道路。因此，许多学者把浙江发展模式的形成看作是无为而治的产物。当然，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各级政府顺应群众的愿望和经济发展的要求，在政策上给予支持，鼓励多种经济形式的发展，促进产权改革，扩大个人的自主权利、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和维护经济秩序等，则有力地促进了这一发展道路的形成和扩展。

具体地说，浙江这条自发式的发展道路的形成，是社会环境与历史文化条件相结合的产物。首先，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的支持。表现为政府对经济发展放松管制，为人们自谋职业，经商办厂提供条件，由此推动了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的兴起。如以前义乌县政府肯定农民的经商行为，为商品交易提供场所设施，推动了小商品市场的发展壮大。在改革开放之初，温州的一些基层政府采取开明政策，允许外出经商的农民挂户经营”，解决弃农经商的农民的身份问题，促进了对计划经济的突破。

其次，浙江具备现代市场经济秩序形成的初始条件，主要指广泛存在于各地的经商务工的历史文化传统。浙江在历史上具有经商务工的传统和相应的文化背景。明清以来江浙一带商品经济就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义乌农村历史上普遍存在“鹅毛换糖”的交易习俗，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小商品市场的繁荣就是这种流动交易方式作为一种文化资本进行再生产的结果。温州在南宋时就成为当时全国的7个对外贸易口岸之一。温州人的商业文化则受在南宋时形成于温州的“永嘉学派”的影响。这一学派讲究实效、注重功利，提倡义利并举，有力地塑造和强化了温州这一地方的民间心理和区域商业文化特色，是温州人善于经商的“文化

基因”。自宋朝以来，温州人就学会了利用自然资源进行商品生产的能力，形成了为市场而生产的传统。鸦片战争后，温州、宁波又被列为通商口岸。温州现在已成为全国最大的鞋业基地，而在历史上，清末温州已出现制鞋业，20世纪30年代温州皮鞋已成名产。这种经商务工的传统正是我们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所需要的资源。在浙江，正是善于经商使人们率先进入了一个不同的时代。使人们在既没有交通枢纽地位又缺乏制造业基础的地方建立了一个个全国闻名的、许多是两头在外的专业市场，如桥头纽扣市场等，浙江目前有300多个当地没有资源依托的块状产业群。

再次，土地资源贫乏等的现实生存压力，迫使人们在农业之外寻求生存的门路，人们选择经商务工正是在这种压力下形成的。浙江人多地少矛盾突出，耕地面积少，1978年人均耕地仅0.6亩，为全国平均的48%，而温州的人均耕地在1978年只有0.53亩。土地资源的贫乏意味着要背井离乡，出外谋生，或者通过发展非农产业以寻求出路。由于商业文化传统的影响，许多人为寻求生计而从事工商业。在温州模式的起源中，地下经济组织如农民冒巨大风险开创的地下工厂、包工队、建筑队等，即是生存环境压力的产物。在浙江义乌起源的“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也与地少的县情有关。土地少促使人们尽量使现有的土地资源获得最大的产出，由于用鸡毛肥田效果比较好，于是人们就到各地用义乌盛产的糖换鸡毛肥田，也以一些日用小商品换取旧衣破鞋、废铜烂铁等博取微利，形成了经商的习俗和敢闯的精神。20世纪60、70年代，在有“鸡毛换糖”交易习俗的义乌，许多农民通过“鸡毛换糖”获得了一定的个人自由和自主权利，并由此积累了资金和经商的经验。当时许多义乌农村的生产队规定，在农闲时允许农民出去“鸡毛换糖”，每人每月交一定数量的鸡毛给生产队做肥料。许多农民出去经商，摆脱了生产队集体的束缚，在完成了任务后，出售多换得的鸡毛，做得好的农民一月因此可得200-300元收入，而当时在生产队一个壮劳力一天的劳动所得一般不到5角钱。这种经历使改革开放后浙江的农民很快加入了经商的行列。

最后，政府在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发展中被放置到了合适的位置，没有过多地掌握支配控制社会的权力，有利于个人自主发展。浙江模式的形成和发展所涉及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政府所起的作用问题。实现政府管理方式、权力行使方式的转变，以形成一个能够支持经济自由发展的体制环境条件是浙江模式获得成功的基本前提。不管是积极引进外资还是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政府的积极作用的表现都是如何为企业提供良好的自由发展的环境条件，做好服务，而不在于政府掌管有多少支配企业的权力。改革开放后，在浙江温州等地，过去惟一的以国家掌握着财产资源并用行政的方式组织生产的方法受到了怀疑和冲击，以市场的方式而不是仅仅以行政的方式来组织物质财富的生产，得到了重视。浙江人的自我改革、自我发展，表明的是人们选择了按市场方式组织生产、配置资源的新的生产方式，从而使浙江经济出现质的变化。我们比较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的不同，可以看到其关键分歧主要是靠什么力量促进市场体系的形成，是谁掌握着资源，用什么方式组织和利用资源的问题。在苏南模式中，由于以前的社队企业相对发达，集体经济实力强，地方政府控制了资金和土地等主要生产要素，所以，政府能够通过现存的工商企业，用行政的、经济的力量，去动员和组织市场资源，由此掌握了推动和指导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形成政府主导型供给型的强制制度变迁，主导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在浙江温州地区，由于与台湾临近，考虑可能发生战争的影响，在改革开放前国家的投资少，相对的社队企业也不发达。由于政府所掌握的资源有限，也不能有效地通过国有和社队企业实现对资源的充分控制利用，所以，就有了个人利用和开发资源的空间，使个体私营企业能够顺利成长起来，并不断自发形成制度创新。

所以，自发秩序的能够形成，是与民间能够利用和发掘的资源有关，与个人的自主权利有关。正是因为市场经济形成之初，政府在掌握和利用资源方面没有充分的手段，因而出现了个人利用这些资源的可能，也为经济的自主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条件。浙江模式所体现的经济发展秩序实际上正是在政府控制资源的缝隙中生长起来的。

二、浙江模式的前景与问题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完善，其他地区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形下，有人认为浙江率先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普及全国，因此浙江在经济体制上的优势已经丧失。如何看待浙江发展模式的优势呢？浙江体制的先发优势还存不存在呢？我们认为，浙江发展模式的优势有两种存在方式：一种是以硬件形式存在的，如多种经济形式的发展，专业市场的形成，小城镇建设，特色工业的兴起，这些都在全国率先获得发展，现在许多地方也获得了很大发展，相应地，浙江先发优势也在削弱。另一种以软件形式存在，是人文背景和商业传统，个人自主意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观念体系，这些根植于人们精神和社会中的

观念、结构，是推动浙江经济发展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它能够转化成经济资本，推动经济资本发挥更大的效率，构成了浙江经济社会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源泉。这些“软件”都是经过长期培养和积淀的，不是能够很快模仿和建立的。浙江人似乎特别能经商，原因在于其内在的商业文化素养所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新观念和社会体系的确立，对于今后浙江的发展会提供巨大的动力。如人们“官”念的转变，信用体系的发展等，都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社会文化资本，是浙江经济发展能够持续稳定发展的动力源。在浙江，经常出现民众因为认为政府有不符合法律政策的行为，对其利益有损害而要告政府及其官员。再如市场信用关系的发达，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目前浙江正在努力把塑造信用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在过去的发展中，民间信用关系对于浙江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民间借贷的广泛存在，就是以一种信用关系为基础的。浙江温州的同乡人之间做生意可以赊销，先发货，后收款，形成一种惯例，人们自觉维护这种制度，这有助于生意的很快扩展。如果有人不讲信用，破坏了同乡间的信用关系，则会受到整个同乡人的孤立。所以，浙江人经商，从当地到全省再到全国，其经营规模和范围的不断扩大、生意的兴旺，同这种信用机制所起的作用关系很大。因此，不能把浙江经济发展的成就仅仅看作是政策的作用，不可轻视其身后的文化精神背景。其他一些地方不能通过照搬政策成功模仿，如有的地方建立了市场后，却出现有场无市的现象，原因也就在于有形的网络体系可以建立，但无形的文化观念和信用链条却很难复制的缘故。

因此，认为浙江的优势已经丧失这只是看到了制度优势的硬件方面，而就软件来说，这一优势在浙江经济未来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正日益体现，体现出浙江发展的内在优势。对于浙江的进一步发展来说，通过改革创新体制，不断培育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新的思想观念、社会文化体系，增强政府为企业服务特别是为个体私营企业服务的意识，鼓励创造新事物，完善法制、实现法治，建立信用体系，使浙江发展模式的软硬件更好地结合，那么，今后浙江经济的发展会有持续的后劲。

浙江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首先，在于自发性本身的局限，说明经济体制的完善、经济层次的提高有一个曲折的发育过程。自发秩序的形成依赖于为人们所遵守的规则的形成，而怎样的规则能够对人们有利并为人们所接受，这要在实践中通过不断的试错才能确立，在没有形成大家能够遵守的规则之前，社会经济各种因素相互间不能起到制约作用，而缺乏内在的相互制约、规则不健全，就会出现混乱无序的现象。对于改革开放后民众自发的体制创新而言，其各种环节之间制约的不完善，是自然的。温州市场经济 20 年的发展浓缩了西欧市场经济 200 多年的发展历程，期间许多发展环节和各种社会因素相互协调制约的机制不可能马上建立，一些发展中的局限，如城市化滞后、产业组织化程度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弱，企业管理者素质偏低，要素市场发育滞后，市场无序现象，产业层次低等，也都是在一个历史时期必然存在的。不过，秩序就是在这种看似无序的表象之下孕育的。

其次，文化传统的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是利弊相依的。一些传统文化观念对于经济的作用也有多面性，比如说，浙江人的文化观念上强调个人自主，也喜欢自己做老板，所以，相互合作比较难，走联合的道路难，企业做不大，在温州这种情景很普遍。如何在个人自主的情形下增进集体协作，促进企业壮大还是个问题。还有家族制企业的问题。虽然家族精神、基于血缘关系的相互信任，有利于形成家庭企业独特的竞争力，而且浙江家族管理方式的存在，也与浙江的一些产业性质有关，它适应制鞋、纺织类产业，以及生产某专一零部件而规模不大的企业。但是，家族管理方式显然地也是不利于企业规模的壮大和开放，不利于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浙江的产业结构也可能会由于广泛的家族本位的企业制度得不到改革而陷入低水平的产业结构中不能自拔，而要打破这种家族制也是不容易的。

再次，浙江模式的问题，还在于政府管理体制的不适应和政府行为缺乏规范化对其演进的影响。对于自发秩序来说，其发展遇到了传统管理体制、思想观念上的阻碍，主要是政府一直是管理者的身份出现的，是管理公有制企业的，而为企业服务的意识，特别是为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服务的观念没有完全确立。政府行为不规范，则严重影响自发秩序的演进。如政府的不规范的收费行为，任意摊派，公职人员的服务意识差等威胁着企业的成长。如果太多的不利，会促使企业向外流动。浙江近些年来有许多企业特别是大企业纷纷外迁，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很大的。虽然，这种企业外流有许多原因，是资源劣势、区位优势和一些企业借助外地优势资源进一步扩张的需要的缘故，但同时，也不能不看到，这种外迁也是与政府的管理体制与政府工作人员作风不适应自发秩序发展的要求有关的，因此，要适应自发秩序的性质，改革政府管理方式，促进政府行为的规范化，以

改善发展环境。

三、浙江模式与利用外资的发展模式的关系问题

浙江发展模式目前似乎正受到以利用外资为主的发展模式的挑战，主要表现为“新苏南模式”对温州发展模式的挑战。所以，一些人认为“新苏南模式”的发展活力会胜过浙江，苏南将来也会比温州好。显而易见，这里揭示的不仅仅是两地发展的前景问题，而是作为依靠内资自发发展与通过引进外资发展两种方法在今后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及如何互补问题。从中国历史上看，通过引进外资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并通过引进管理方式、先进技术和市场经济观念达到改造社会经济体制的目的。改革开放以来，在引进外资多的地区和过去西方国家投资较多、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的地方，也走在了发展的前列。这里不但表现为有丰富的海外关系，能够接受较多的外来投资，也体现为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关系对于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就浙江的发展模式而言，走的主要是依靠自我积累的内源式发展道路。浙江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虽然走在全国前列，但利用外资同其他沿海省市相比却不多。统计显示，即使在全国大力鼓励引进外资的1992年以后的几年里，温州实际引进外资数量也很少。在1995年到1998年，外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温州不到3%，而同期苏南地区平均不低于30%。到2002年上半年，浙江省累计利用外资额只占广东的1/6，江苏的1/4，上海的1/2。这原因除了政府在引进外资认识和力度上有不到位之处，主要的原因之一还是浙江走的是一条内向型的资本原始积累和人力资本集聚的‘夕发展路子，浙江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经济较发达，其涉及的产业和产品的领域与一些外商欲投资的相类同。因为这个时期来中国大陆投资的主要是港台中小资本和海外华人资本，大多投资于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因此，在特定的发展阶段内浙江省对于引进外资的需求不大。而随着买方市场的形成，各种层次低、技术含量低的产品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浙江经济发展需要通过结构调整、实现产业升级，发展符合现代管理要求的规模大的企业，以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而这也需要吸引海外大的、具有高技术的企业投资，达到较快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目的，利用外资对于促进浙江产业的互补的要求也迫切了。因此，积极利用外资也成了浙江今后快速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是一条见效快的路子。而现在国外投资的趋势也是符合浙江利用外资的要求的，目前来中国大陆投资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增多，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增多。

通过利用西方发达国家的大资本和高新技术，对于加快浙江社会经济体制走向现代化有现实意义。引进外资素质的不同，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管理体制和观念的改变也有不同的作用，因此，对于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引入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与引进海外华人资本就有不同之处。华人资本本质上受中国文化影响，会很快地适应转型时期特有的管理体制、官场文化和游戏规则，不能发挥其先进管理体制的作用和对社会体制的改造作用。所以，对现有的体制可以不作大的改动就能适应利用外资需要。而如果利用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则对体制有完全不同的要求，下一阶段外资引入若希望遵循着加速的轨迹发展，必定伴随着国内制度、文化环境的变革与世界接轨，因此，浙江要能够缩短社会经济体制结构的转型，加快实现管理制度和文化环境与国际接轨，必然地要努力加快促进经济社会体制向现代化发展，这也是在加入WTO以后新一轮制度变革和对外开放的根本要求。